

日六月二十年六十三國民

版出六期星逢每

行印社版出紀世

二之號九巷條三門華西京南

世 紀 評 論

社 論

如果四外長會議再失敗的話

專 論

選舉・憲政與東西文化

陳序經

評梁漱溟的「預告選災・追論憲政」

重整我們的「家」和「鄉」

謝扶雅

老人問題的癥結

潘光旦

論外匯平衡基金委員會

陳嘉傑

文 藝

開始寫劇後的莎士比亞

李慕白

一 週 間

物價飛漲下政府實行經濟戡亂

農部將推行糧食增產工作

編 輯 後 記



元千四售實期本

公司工業



永利化學

◀品出要主▶

廠鹼

廠經酸硫

• 碱 純 •

• 亞 尼 摩 阿 •

• 碱 燒 •

• 粉 田 肥 •

• 酸 硫 •

省北河

省蘇江

沽塘

甸甲卸縣合六

處理經區東華 ———— 處理管總

樓四號零一四路川四海上

七—六五—六—六五—話電

處理經各他其

地等口漢州廣慶重津天

行銀業建

處 理 管 總

號一廿村範模路會育體東海上

七五〇二六(二〇) 話電 七八三七 號掛報電

行 分

上海分行 南京分行 重慶分行 成都分行 長沙分行 漢口分行 天津分行

上海 天津 漢口 長沙 成都 重慶 南京 電報掛號 九七二〇 九七三〇 九七四〇 九七五〇 九七六〇 九七七〇 九七八〇 九七九〇 九八〇〇 九八一〇 九八二〇 九八三〇 九八四〇 九八五〇 九八六〇 九八七〇 九八八〇 九八九〇 九九〇〇 九九一〇 九九二〇 九九三〇 九九四〇 九九五〇 九九六〇 九九七〇 九九八〇 九九九〇 一〇〇〇〇

金城銀行

總行 上海江西路

各地分支行處

上海 重慶 蘭州 蘇州 成都
漢中 常州 自流井 西安 無錫
威遠 鄭州 南通 樂山 開封
南京 瀘縣 北平 漢口 貴陽
天津 武昌 昆明 青島 長沙
廣州 沅陵 天寶 雞水 香港

一 本刊訂購價目

預 全年(四十八期) 十四萬元
定 半年(二十四期) 七萬五千元
三 三月(十二期) 四萬五千元

售 零 每册四千元

郵資

平寄 免

航平 每册附加二千元

掛號 每册附加八百元

航掛 每册附加二千八百元

注意：本刊自三卷起，訂閱辦法，重行改訂，欲訂從速。

二 同業批發經銷一律七折

訂購經銷請逕向本社洽辦

世紀評論

社址：南京西華門三條巷九號之二
電話：二二一八 五一五

世紀出版社印行

南京西華門

三條巷九號之二

電話：二二八一五



上海辦事處

北京路二五五號七樓

印刷者：

南京美吉印刷社



社論

如果四外長會議再失敗的話

聯合國大會剛剛結束，倫敦外長會議跟着開幕，關心世界和平前途人士，總希望東西雙方的意見能日趨接近，對於當前幾個重要問題能獲得協議。戰後殘破的世界，瘡痍滿目，危機四伏，不能再事劍拔弩張，陷整個人類於萬劫不回的境地。

聯合國大會很顯明的揭示着美蘇兩國間的裂痕。在會議的進行當中，兩國代表針鋒相對，各不相下，形成一種外交戰，即歐美報紙所謂之「冷戰」(Cold War)，使聯合國組織本身為之動搖。現在大會總算安然渡過了。問題雖然沒有解決，而各國所要說的話都盡量的說出了，或者可以因此而感覺輕鬆一點。國際齟齬藉着這個機會得以公開，這未始不是一種可寶貴的收穫。

外長會議的課題是商討對德奧兩國的和約。我們還記得本年三月十日美蘇英法四國外長曾為此一問題在蘇京莫斯科舉行會議。因為各國意見的紛歧，所以那次會議繼續七個星期之久，而一無所獲，不歡而散。在閉會的時候，四外長同意於本年十一月在倫敦再行會議，繼續商討。現在正開着的外長會議就是根據那次的決議而來的(參閱本刊一卷十九期社論)。

對德奧和約爭執焦點包括賠款、邊疆、政制等問題。關於這些問題美蘇兩國的意見距離尚遠，而且有根本的差異。經過一個多星期的辯論，蘇聯與西方三國間對德國來日命運的解決方法，不能覓致任何妥協的基礎。例如政制問題，馬歇爾所提出的方案是聯邦制度，各邦保留相當實權；莫洛托夫以為德國應該從速設立強有力之中央政府。上次莫斯科會議時兩國的主張就是如此，現在又是如此。如果兩國仍然堅持自己的主張，這次的會議必然和上次要有同樣的命運。史達林元帥曾把上次會議比作斥堠部隊初步的接觸。他以為按照向例，各人於疲於爭辯之後，就會承認折衷辦法的必要。我們希望

史氏所說的折衷辦法可以在這次會議中產生出來。德奧和約能從速成立，歐洲的復興可以去掉了一個重要的障礙，世界局勢也可因之而改觀。

中央集權與聯邦分權在理論上互有長短，談不到絕對的優劣。本來盟國對於未來的德國最大的目標，是根本剷除納粹思想與軍事帝國主義。德國的政制要讓德國的人民自己決定，盟國不必越俎代庖，而美蘇兩國為此問題所以爭辯不休，互不相讓者，其中自有原因在焉。主要的原因還是心理上的猜忌。在美國看來，集權的中央政制最容易受共產主義的利用。在蘇聯佔領區內共產黨的力量已經聲勢浩大。將來對德和約成立後，佔領各國必須逐漸撤減駐德軍隊，以至完全退出為止。德國政治恢復平時狀態，一切政黨都可以自由活動。美國對於自由主義的政黨不能予以特別扶持，但共產主義的政黨却不能與蘇聯斷絕關係。無論在那一個國度裏，共產主義的政黨都以蘇聯的利益高於一切，他們有時可以不顧其祖國的利益，蘇聯的利益是不能須臾忘記的。這樣的政黨在其活動上自然要受蘇聯的導演。如此，這個政黨潛滋暗長的能力必然超過自由主義政黨之上。在集權的政體下，把握了中央政府就等於把握了全國。共產黨背後有蘇聯的支持，再加上嚴密的紀律，奮鬥的精神，把握中央政府的可能性要比任何政黨為高。這是美國反對中央集權最基本的理由。因為這是最基本的理由，美國未必願意坦白的說出來。擺在檯面上的理由當然是採行集權式的中央政制，可以促成變相的納粹主義的復活，顯為不智。所以不如實施聯邦的政制，擴大地方的自治權，使德國再不能為世界和平的威脅。在蘇聯看來，現在的英美佔領區的人民受過英美政治的洗禮，在聯邦分治的政制下，英美在這些地域內的力量是不會消滅的。這是共產主義發展的一種鉅大的阻力。由此以觀，美蘇對政制問題的爭執是由於心理上的猜忌。這種猜忌不能祛除，對德和約即無從談起。

歐洲風雨飄飄，經濟凋敝的局勢，使對德和約不能解決了。和約不能成立即平時的狀態不能恢復，對於任何國家都是不利的。事實不允許再事拖延、因循，和自私自利的明爭暗鬥。問題總要解決的。史達林元帥所說：『各人於疲于爭辯之後，就會承認折衷辦法的必要』，確是一句至理名言，難道經過兩次的外長會議，還不到『疲於爭辯』的時候嗎？

萬一這次外長會議又告失敗（目前的情形不能使我們過分樂觀），又該怎麼樣呢？美國前國務卿貝爾納斯在他最近所出版的 *Speaking Easily* 一書裏（國內已有三種譯本）說，如果蘇聯不能同意於和約的成立，西方各國只有一個辦法，就是先與西德成立單獨和約，然後『用武力將蘇聯趕出德境』。這是所謂強硬政策最露骨的代表。但我們相信貝爾納斯絕不會希望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跟着再有第三次世界大戰。戰爭不能解決問題，相反的，戰爭會製造出許多新的問題來。如果不能解決的問題都用武力去解決，那麼，世界將永遠沒有和平之一日了。貝爾納斯以在野的身份所說的話當然不能代表美國政府，更不能代表美國大多數的人民。世界無論那一個國家的人民沒有不厭惡戰爭的。美國不是例外。蘇聯也不是例外。蘇聯這次大戰所受的損失夠大了，須有長久的休養，多年的努力，才能恢復戰前的景象。在此積極建設的期間，絕不會輕於言戰的。

倫敦外長會議的成功是歐洲的幸福，也就是全世界的幸福。設不幸而失敗，對於世界和平的前途雖然留下一道濃厚的陰影，但尚不到訴諸武力的程度。兩個世界、兩個壁壘會繼續的存在着，然而兩個壁壘的存在，並不是繼續的磨擦着。時間久了，或者兩方面可以各在其勢力範圍內自求發展，相安無事。這是退一步的看法，當然不是理想的局面。但無論如何，總比戰爭好多了。



專論

選舉·憲政與東西文化(一)

陳序經

——評梁漱溟的「預告選災·追論憲政」——

一

我們知道，二十多年來，梁漱溟先生是一位最喜歡談東西文化這個問題的人物；然而照我個人的意見，梁先生對於西洋文化的認識，既是很爲淺薄，對於中國文化的了解，也未見得很爲透切。結果是，在他的關於這個問題的著作裏，像我以前已經一再指出，往往是錯誤百出，矛盾叢生。最近梁先生在觀察的第三卷第四與第五期中，發表了「預告選災·追論憲政」一文，我以爲，他在這篇文裏所討論的問題，在題目上、在表面上，雖是一個中國政治的問題，可是在內容上、在根本上，還是一個東西文化的問題。而且，也像他的以往的著作一樣的，有了不少的錯誤，有了很多的矛盾。

他的這種言論，在他看起來，雖是「未得高明之士，唱和於學術界」然而我們也知道，國人因爲深受數千年來的傳統思想的影響，與文化惰性的作祟，在有意或無意中，與他作同樣的看法的，並不乏人。在各種不同名詞之下，像什麼新儒學派，什麼新生活運動等等，又何嘗不與他的主張，有了根本或多少相同之處？因此之故，我讀了這篇文章之後，忍不住的要借本刊的篇幅，指摘他的錯誤與他的矛盾。

生說：

二

所謂選災，據梁漱溟先生的意見，是指全國大選舉之爲災而言。梁先生我並不敢杜撰此怪名詞，這是十年前（民國二十五年）全國舉辦國民大會普選時，善於取譚底吳稚暉老先生所創造。當時吳老看了各地爲選舉而鬧得舉國騷然雞犬不寧，公私耗財之鉅，社會風紀秩序破壞之烈，鄉里友好結怨成仇，傷亡而繼之以詞訟，精神物質，一切損失之無法計算，於是從此憫憐之懷，發爲諷刺之言。他歎息於水災、旱災、風災、蟲災、……任何一種災，亦沒有這選災普遍而深入。這確是個古所未有比什麼都重大的災禍。然而不幸的很，今年我們在許多水災（兩廣成都各處）旱災（山西河北等處）和兵災外，又將有一次這重大底選災到來。

梁先生又指出中國若學西洋的競選，必只有惡果。他說：

打架鬥毆，有形之災，亦既慘矣。社會風紀，鄉里人情之無形破壞，尤遺禍無窮。不但求爲改進後之西洋選舉不可得，即求爲西洋一場酣鬥，亦豈可得？它除了醜惡，還是醜惡，別無所有。

我們在這裏，不必去考究善於取譚、與喜爲諷刺的吳稚暉先生之杜撰

這個名詞，是否同梁漱溟先生一樣的感覺到所謂選舉的災害的重大，比之任何災害為甚。我們所要指出的，是在對於東西文化的態度上，吳稚暉先生之於梁漱溟先生，却有了根本不同之處。前者是重於西化的主張，而後者却趨於復古的途徑。假使梁漱溟先生因為借重了吳稚暉先生所杜撰這個名詞，而使讀者沒有認清這一點，那便是一種錯誤了。

我們承認，西洋的選舉制度，不只行之於中國，免不了有多少毛病，就是在西洋經過多少年的改善，也不能說是完全沒有流弊。但是，我們若正像梁先生所說：「中國需要民主，亦需要憲政」，那麼這種選舉制度，總不能不加以採納。假使因為有了流弊，遂以為完全要不得，那是「因噎而廢食」了。完全只有利而沒有弊的事，在歷史上，在世界上，是不容易找出來的。假使因為有了多少毛病，而就要完全放棄；那麼，一切的政治，以至於社會的改進，就無從興辦了。我們知道，凡是文化情性愈大的社會，其革新也必愈難，而所需要的代價，也必愈多。但是反過來說，若是因為代價太大，而不願去改革，則其流弊恐怕愈來愈多。比方，革命是流血的事，然而在某個時代，或某種社會裏，革命是需要的。俄國的革命，法國的革命，以至美國的獨立，沒有一件不是流血的事。但是假使俄國與法國不革命，則俄國與法國避免不了專制政治的淫威與毒害。假使美國不獨立，美國就不易那麼快的脫離其殖民地的地位。在俄國革命，或在法國革命，以至美國革命的時候，一般的人們，何嘗不當革命的災害，甚於洪水之禍患，然而經過了相當的時期之後，弊病慢慢的改良，到了現在呢？不只美國人不會說現在的美國不如屬地時代的美國；不只法國人不會說現在的法國不如專制時代的法國；就是革命的流血還在記憶中的一般俄國人，大概也不會說，現在的俄國不如沙皇時代的俄國罷。

俄國的革命，在意識上是共產主義，這是西歐的產物。假使俄國人，以為這不是俄國的東西而不可要，則俄國的革命，是災害了、多事了。而況，照馬克斯的預料，這種革命應當先產生於工業化程度很高的西歐，而不應先發現於工業比較很落後的俄國呢？法國的革命，在事實上，也是多少受了美國的獨立運動，與英國的憲政運動的影響。假使法國人像孟德斯

鳩、盧梭等，以為法國的民主憲政，應當從其固有文化中的暴君制度，或專制政體引申發揮，那麼，法國的革命是不會成功的。而法國的民主憲政也不會實現了。

總而言之，俄國的革命以至於今，不出三十年，革命所產生出的病弊，我們還能回憶、或且還能看見；法國革命的成功，經過差不多百年的歷史；美國之脫離英國，雖在一八八二年，然而十八世紀的末年以至十九世紀的初葉的美國，不能稱為真正統一，固不待言，就是十九世紀下半期的美國的南北戰爭，又何嘗不是充分表示從殖民地時代，以至脫離英國以後的互相猜忌與互相鬥爭所遺留下來的禍患呢？然而不只是讀美國或法國的歷史的人，不能不承認百餘年來，這兩個國家，在政治上，以至在文化的其他方面，有了很大的進步，就是讀了俄國的歷史的人，也不能不承認，三十年來，蘇聯在這些方面，也有多少的改善。十八世紀的柏克 *Edmund Burke* 對於美洲的殖民地的見解，雖然是半個世紀超出他的時代，然而他的「法國革命的回想」(*Reflection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 不只表示他是過於保守，而且表示他是未免短見，只看當時的法國的病弊，沒有看到在一百年後，這種代價並不白廢。這是讀歷史的人們所不應忽略的。

革命民主、憲政固是這樣，選舉制度又何嘗不是這樣呢？就以民主憲政先進的英國來說，選舉制度之改善，也要經過好幾百年的歷史。從前也可以說是有錢有勢的人纔能選舉或被選，而今則不是這樣了。從前只是男人可以競選，而今則女子也能這樣作了。英國固是這樣，美國以至其他的好多國家，又何嘗不是這樣呢？美國的政治頭目 *Political Boss*，紐約的塔米爾爾，在美國的選舉制度上，又何嘗不作出多少災害，然而美國人並不因此而放棄其選舉制度。反而他們覺得這種制度的流弊都可以時時刻刻加以糾正、加以改善。

梁漱溟先生並非沒有看到這一點，所以他說：

外國競選，雖有弊，大致總過得去。彼固有其數百年所養者（法治之效）習慣之成，條件之備，一般道德水準知識水準）在也。然而他又說：

中國而言競選，一切無所循、無所據、無所養，多數老百姓，茫然不知所謂，只有聽任此無所不至之人（按指逞慾，而亡恥與有錢有勢者），表演其無所不至而已，尙何災之不成？

這是牽涉到整個中西文化的問題。我們當在後面再加論列。我們在這裏所要說明的，就是梁先生雖然指出外國競選是有弊病，但是他也承認大致總過得去，而其所以過得去的原因，就是因為他們不只有了好的法治、習慣、條件等等，而且有了較高的道德與知識的水準。反之，中國之所以不能言競選，就是因為中國缺乏了這些東西。這就是等於說是因為中國的法治、習慣、條件種種，以至道德知識水準，都比不上西洋。實言之，也可以說是中國文化是比不上西洋的。

我以為正是因為中國的文化比不上西洋的，所以中國需要西化，澈底的西化，全盤去西化。競選固要舉辦，法治習慣條件種種以至道德知識水準，也要改善。反之若自甘落後，則中國前途還有什麼希望呢？

西洋人之所以至此者，既乃有其數百年所養者，那麼中國要達到這種地步，就不能不用多少時間，去效法與試驗，而求其所養者。假使因為其他條件尚未具備，而在未競選之前，就預告選災，這是等於未食之前，怕噎廢食了。

何況梁先生豈不是這樣說過嗎？

英國式憲政，是近二三百年社會進步逐漸開出來的。而有它，更大促進社會之進步。二者互相表裏，迭相為因果。於是今天的憲政，和今天的進步。……再從其效率言之，往時西歐以二三十年得之者，後來日本以六七十得之，蘇聯更以二三十年得之，固然後來居上，由於坐收前人研究發明之功，亦為日本較有目標預期，蘇聯更有計劃之故，然則於此何去何從，亦可思矣。

我們先要指出，俄國之學西歐，並不只是二三十年的歷史，而乃有了二百多年的歷史，而特別是彼得大帝以後，俄國歐洲部分，西化的基礎已逐漸的建立起來。蘇聯在這二三十年來，不過是加強其速度而已。而且蘇聯與日本之效法西歐，在今日看起來，不只是還未見得後來居上，而且相

差得多。至於政治方面的民主憲政，蘇聯與日本之未見得學到英美，更是一件很為顯明的事。但是我們所要特別加以注意的，是梁先生既以為蘇聯的更有計劃而效法西歐，日本的較有目標去實行西化，而坐收前人研究發明之功，那麼中國又何嘗不能够這樣作呢？若說中國沒有其所養者在，所以不能效法，那麼日本在六七十年前，俄國在二百年前，又那裏有所養者在以爲效法西洋的基礎呢？這樣一來，彼得大帝的改革，蘇聯法國的革命，以至美國的獨立，又豈非是多事多害之舉嗎？

不但這樣，梁先生又告訴我們道：

今日所行一切，學自外國，別底猶可，唯自己出頭競選觀然不以為恥，實太悖於固有優美的謙德。……謙本來是中國人之道，後來人的謙，未必直；流俗人的謙，未必真。不真，不足貴，然猶勝於觀然無恥，不顧一切，以逞其所慾者。不為逞其所慾，他不會出頭幹這樣。逞慾之人，就是中國所最不許可的。……逞慾而亡恥，則其無所不至，自在意中，此其所以可怕也。

梁先生在一方面雖以為競選是觀然無恥，然一方面俟我們在上面已經指出，「外國競選雖有弊，大致總過得去，彼固有其數百年所養者在」，而所謂所養者在中國的一般道德水準的優越，又是一種重要因素，競選既是恥事，競選又是合於道德的，這又豈不是一個很大的矛盾嗎？

而且，他一方面雖以為競選是無恥，而實大悖於固有優美之謙德，然一方面又說道：

民主憲政，即有與我們精神相通之處。……民主就是承認旁人，承認旁人即與恕謙讓相通。……憲政是有爭而無亂之道，無亂即與禮相通。

這豈不又是一個矛盾嗎？除非梁先生以為西洋的禮讓謙恕，以至於整個道德要素之於中國的是有了不同之處，則這種矛盾，是無法解釋的。而況他却明明白白的指出西洋的這些德性之於中國的是相通的呢？

其實，從梁先生上面那段話裏看起來，中國本來之謙，早已墜落，所以他說「後來人的謙，未必真，流俗人的謙，未必真。」在沒有介紹西洋

的競選之前，中國的謙，早已不真而流為虛偽，然而梁先生還說這種虛偽的謙，猶勝於競選之觀然無恥，猶勝於西洋之有謙的民主，以及有禮的憲政，這真可以說是矛盾中之矛盾了。

我們知道，梁先生之所排斥的是西洋的競選之輸入中國，而他所提倡的是中國古代的選舉。這就是他所說的「中國的老選舉」。且看他說：

選舉競爭，在西洋，本從其古人粗樸行動，漸漸理性化、理智化而來，為數百年精神上走之結果，其事當然可行，當然可資之以建立民主政治。但中國的歷史文化，完全兩樣。今要學他，便與固有美德相悖，却是精神向下去了。匪獨民主政治不能資以建立，其後果之惡，將不可言，我之所謂不可學者，謂此。

西洋的競選，是否像梁先生所說是從其古人粗樸行動而來，我們不必在這裏討論，然而一方面既說西洋的競選，可以資之以建立民主政治，一方面又說這種競選不可學，又是一種矛盾了。梁先生又說：

唯公平之選舉，才見民意。一般老百姓，無錢、無勢、無知、無胆、無空閒、無興趣。……試問他們的意想，從何表見？其結果，當然只是對成勢力的那些新舊惡勢力之一度取得民選美名，更加他們一層合法保障而已。

我們應當指出，西洋的選舉之在今日，所以像梁先生所說大致總過得去，而當然可行者，也非一朝一夕所能作到這個地步。中國而欲學西洋，不只要經過一個相當的時間，而且，同時要使一般老百姓，逐漸的有錢、有勢、有知、有胆、有空閒、有興趣。西洋以往的一般老百姓，既也沒有這些，而是逐漸的得到的，那麼除了中國的老百姓，甘願永遠是生活於這樣狀態之下，則中國老百姓，為什麼不能因了這種情形的改變，而實行選舉呢？而況實行選舉，也是推動民主憲政的一種主動力，而推動民主憲政，也是使一般老百姓，能够逐漸的有錢、有勢、有知、有胆、有空閒、有興趣的一種主動力呢？梁先生對於這一點，也無否認。而況，他既指出西洋的選舉乃有所養者，同時他又指出「一切學自西洋別的既猶可，為什麼選舉就不可呢？因為學了西洋的別的東西，則中國也有其所養者在，那

麼選舉之取法於西洋尚有什麼問題呢？

其實，梁先生所歌頌的中國的老選舉，究竟是什麼東西，他就沒有明白的解釋。他說：「在中國老政治上，老選舉上，本沒有黨派」，然而他又緊接着說：「或至少不以為黨派為正常」。這又是承認有了黨派了。只指出中國的選舉之於西洋的選舉，只是同名而異實，所以他說：

中國古時行鄉舉里選，後來歷代史書多有選舉制，那完全與今日所行，同名而異實。

我們以為不只是西洋的選舉之於中國的選舉，有了差異，就是中國固有的選舉，又何嘗沒有差異？王制所記的選士，是先試之學，而給以作官的地位。周代又有所謂賓興的制度，所謂三年大比，與其賢能，而不必入國學。漢代的舉賢能方正，也謂之選舉，這與以往的選舉也不見得完全相同。然則梁先生所提倡的古代選舉，究竟是那一種呢？

其實，與其說中國的選舉之於西洋的是同名而異實，不如說中國的選舉，只是有名而無實。中國古代的選舉，雖如上面所說，有其自身的不同之處，然而根本上，是「御命式」的任命，並非由民衆選出的人士，而乃紳士或官家所選出的人物。王制所謂：「令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周禮所謂：「三年則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而與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衆寡，以禮禮賓之」。漢文帝恆在位之二年，曾下詔曰：「二三執政，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匡朕不逮」。又十五又詔：「諸侯、王、公卿、郡守、舉賢良能直言極諫者」。這豈不是御命式的選舉嗎？豈不是只是有名而無實的選舉嗎？

不但這樣，就是這種選舉，也有了不小病弊。東漢舉士的濫溢，所謂辟賢召士，一些自命為士人賢者，迷於仕途，不以卑微自詛，這又豈是知恥的人所作的事情嗎？

何況在中國的仕途上，觀然無恥之事太多了。蘇秦張儀以及其徒衆之低首下心，游說諸侯，以求得一官半職，固不見比之今日之自己出頭競選為高明，孔子孟子之僕僕風塵，周游列國，莫非為利祿薰心。難道這就不是觀然無恥嗎？讀李白的詩的人，總能羨慕其氣節清高，然而一讀了他

的「與韓荆州書」的人，真不免感覺到他是作了搖尾乞憐的狀態。所謂「一登龍門。則聲價十倍」；所謂「君侯何惜階前盈尺之地，不使白揚眉吐氣，激昂青雲耶？」這簡直是失了詩聖的尊嚴了。所謂中國的謙讓之道，難道就是這樣嗎？此外，又如讀韓愈的「進學解」的人，以至於其他之所

重整我們的「家」和「鄉」

謝扶雅

謂懷才不遇的人士的詩文的人，不能不感到中國人之熱於升官發財，而忽於禮義廉恥。到了近來，政治上的鑽營實官，官吏中的貪污罪行，難道還未鬧得舉國騷然嗎？難道這些怪象，比之自己出頭競選還為好嗎？

(待續)

中國在今天，真已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八年抗戰，家破人亡，復員未完，繼以內戰。創上加創，生機垂滅。除了幾個權貴豪門而外，百分之九十九以上，實在都已活不下去。無論有怎樣良藥、方案、緊急措施，似乎皆不發生效力。現在又可以聽到抗戰前所普遍流行的「中國不亡是無天理」的那種嘆息了！

不過今日國際的局面，沒有辦法把中國來「瓜分」。中國自己「魚爛而亡」吧，這雖是極有可能，但因她老人家已有五千年壽命，倒也「百足之蟲，死而不殞」，着實可以拖，拖，……拖到還沒一個醫生可以預定她何日何時真正斷氣。如果她老人家命運未斬，奇蹟降臨，也難保不會縱至山窮水盡，忽見柳暗花明？這是目下做一個中國人的萬分無奈的、唯一的半點希望。本文便從這半點希望中出發。

本來百醫束手，處方是實在沒法開的了。誠然我們的大題目是所謂「建國」，然而從建國「方略」起，以至若干次的幾全大會、幾中全會，所發表的宣言和「方案」，沒有一張可行，沒有一張能行。根本上，中國人腦筋中一向沒有西方那種「國」(State)的概念，又「建」個什麼來？我們倒有家鄉觀念，卻沒有國家觀念。歷史上，古籍中的「國」字，無非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國」中的一部分，絕不同於西方所謂近代國家(Modern State)的「國」。我們倫理意識極為濃厚，而政治意識却比較淡薄。如果有些政治組織的思想，則勉可以說「鄉」是政治單位。「家」乃是倫理單位，是中國的根本文化。中國不能說沒有她獨特的

文化，也不能硬判她的文化比西方為低或高。然而她的政治組織和管理確實不大發達和精密。以西方政治學名詞來比擬，她的政治，不是民治，也不是君治，或貴族政治，神權政治……，只能勉強說是「鄉治」。鄉治是多元的、分權的、鬆散的，不大像「組織」，亦不大像「管理」。鄉治的缺點在此，而其特色亦在此——它是無組織的組織。不管理的管理。要之，中國的政治不在朝廷(中央)，不在藩郡府道(省級)，甚至亦不在縣。打官司切莫上衙門去；繳糧納稅，只是老百姓不自覺的慣例的傳統行為——大約由於「君子者食於人，小人者食人」的倫理思想，絕沒有任何政治的或法律的權利義務關係。辦理公衆事務的機構(?)是在鄉社。這是中國的唯一政治單位，可惜這個單位早已自鴉片戰役以來逐漸崩壞而至於虛無。比年則由流氓地痞衝入填防，惡劣混亂，不可究詰。中山先生所主張的縣單位自治，以及國民政府所實施的新縣制，還不能和本國固有的文化聯繫起來，自然和人民實際生活脫節。於是中國今日的政治，舊者早已倒坍，新者沒有建樹。

中國固有的文化是倫理性的，其在基層的表現便是所謂家族。倫理是指人和人相互間的正常關係，亦稱倫常。中國的「五倫」以至擴充到無論多少倫皆以「夫婦」「父子」「兄弟」「三倫為根柢。」「朋友」是兄弟的推衍，君臣是父子的推衍，此外亦皆可以此類推。這種倫理文化，決不能斷定它是封建性的，更不是專制強權。甚至所謂「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的學說，也是雙方對待，而不是單方絕對，所以不能說它是「片

而道德」。中國的道德，完全立基於雙方對待的交互性（mutuality），作者已對此問題有多年的研究，發表過不少專文，這裏恕無篇幅贅敘。總之，中國的政治是倫理的延長，而中國論理是「家」本位的倫理，即是夫婦倫理。所謂「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中庸引易傳）。夫婦倫理是相偶性的，是交互性的，是淵源於遼遠的生物學的背景。孤陰不生，孤陽不長。夫待婦而義，婦待夫而柔。夫若無婦，夫德無依；婦若無夫，婦德不立。父亦待子而慈，子亦待父而孝。以至君王和臣民，也是交互的、相偶的，不是君權絕對，臣民是其虜奴，孔孟諸子對此說得異常透澈詳明：「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見論語）；「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寇讎」；「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具見孟子）。湯武對桀紂的革命，乃是桀紂在倫理上已成「一夫」，毫無君德，不成爲君，於是臣民可以殺之，應該殺之，所謂「大義滅親」。試想這可以說是封建道德嗎？可以說是片面道德和絕對專制嗎？中國倫理不言平等，而自有其平等者在——它叫做「差等」——由親及疏，由近及遠，所謂「親親之殺」（讀如義，遞減也）。中國不甚贊成普遍的博愛，而主張等差的「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中國倫理亦不談自由，但有其相當的自由——它可以叫做「自在」或「自得」。孟子所謂「無入而不自得也」，孔子所自白的「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這都是中國式的自由。要之，中國原有她那一套獨特的文化體系，不待煩言。

爭自由，爭平等，乃是西方的格調。他們代代身受「俘虜」、「奴隸」、「勞動者」的束縛和不平，逼得爭求解放。既有「階級」之屹立，那得不作「鬥爭」？所以自由平等完全從不自由不平等而「爭」來的。中國本無這種背景，今唱自由平等，豈不是無的放矢。整個西方文化體系的關鍵，就繫於這個「爭」字。希臘哲人赫拉利圖（Hera Kleitos）的名言是：「爭爲萬物之父」（Strife is the father of all things）。中國人說「男女醞醞，萬物化生」；西方人却說：「鬥爭鬥爭，萬物化生」。中國人的生命觀，重在生殖（求偶），故取「偶性」。西方人的生命觀，重在生存（求食），故取「個性」和「衆性」。個性表現爲自由競爭，衆性表現爲集

體共鬥。而這兩者又互相矛盾而作鬥爭，演至今日，乃表現爲英美系和斯拉夫系（戰前是大陸系）的兩大壁壘。却一方自詡爲「自由」的倫理精神，他方自詡爲「平等」的倫理精神，復皆互唱民主——堅認自己的纔是真民主而斥對方爲僞民主。今日中國揚言吸取西方新思想，所以對英美文化也狂啖大嚼，對蘇聯——尤其是一黨專政、統制、組訓一類作風，也模倣到十足，畫虎畫犬，全不之顧。在隔宵的美人臉上，舊脂粉未曾洗淨，却重重疊疊東一塊西一塊地塗將幾種不同的新脂粉上去！

東方美本未嘗無它的特色，輕敷淡掃，豐韻自存。英美和蘇聯，都是重姘濃豔，口脂唯恐其不紅，服飾唯恐其無色。它們各有它們那一套，各有它們的背景。可惜共產黨學不到蘇聯，國民黨也學不到英美，大家只是盲人瞎馬，東抹西塗，而復爭風吃醋，混戰一堂。這是今天中國的寫照。蘇聯式的民主和英美的民主，固未嘗不可學，不過要學它們之所長，而不該偏學它們之所短。同時更不該先毀滅自己本身，是則皮之不存，毛將焉傳？所以第一，必須講究如何恢復固有的健康，使保持美的體質，而復考慮附加者姘節問題，庶幾成爲巧笑美目素以爲絢的全璧。如果健康已損，甚至整個身體根本毀壞無餘，則儘講蘇姘，或修談美飾，又有何用，豈非絕頂糊塗！作者所提出的重整家鄉，就是恢復固有健康的根本對策。家鄉是中國的老根子，是中國的基本生命，現在却被破壞殘碎，以至險象叢生。今日者，與其高論「統一」「憲政」，總統內閣，集權分權，毋寧先把各自的老家重整起來。與其大言鞏固國防，毋寧先使本鄉確實做到鞏固的地位。有志之士，熱血青年，知識分子，爲何不回至本鄉本村，與父老子弟同謀地方建設，使零亂破碎的家鄉從流氓地痞土劣惡棍的手中解救出來，加以安頓與整理，爲之汰暴安良，興利除弊，成爲一個大體可以自給自立自衛的「王國」。在鄉邑中做一件事是一件事，不會抵消，不會兜圈子，所謂得寸則寸，得尺則尺。一個大學生投在大都市內，真是滄海一粟，但若回至本邑，也許可以鶴立雞羣，發生領導作用。如果有三五個同志一起下鄉，聯合樹立善良勢力，則影響便更大了。

中國政治的出路，據作者個人的估計，可以素描爲：（一）多元的鄉

單位自治，易收小國寡民之效；（三）若干的「T.V.A.」式的國營事業，依經濟資源地域而分配。前者是農業性的，後者是工業性的，相互交織，共依共榮。前者為經，後者為緯，亦可以說後者是綱，前者是紀，因為國營的T.V.A.好比幹線，而各鄉好比一樹的纍纍嘉果，不過果子終是我們辛勤的最後目的。每一個鄉，必須構成獨立自足的單位（若干邊邑窮鄉，最初由中央幫助），中央和省級的財政，概取之於國營總局。大學經費皆由局出，但應為各鄉培養專門人材，鄉自辦國民學校和師範學校。在這個政治系統中，應當切實記取：鄉是本體，而各總局無非是輔助性質。後者不應壟斷前者，或壓迫前者，却反而應該服務前者。中央政府處於調節的地位，甚至可以說祇是顧問地位，髣髴「垂拱仰成」。總之，政治不應頭重腳輕，而應十分鞏固基礎，這是就體制而言。

至就政治理想而言，中國大可以發展成「倫理的民主」(Ethical Democracy)。這就是不偏於英美系的政治民主(Political democracy)，也不偏於蘇聯系的經濟民主(Economic democracy)，却從倫理的本位建立一種「文化的民主主義」。上面講過：中國的倫理是家庭性的、交互性的，即是夫婦性的。我們應當珍視這固有的「散帶」，而重整家山，光復舊物。但往昔的大家族和宗法，自己非淘汰不可；不過那是制度，不是精神。作者這裏所言重整的「家」，是意味着一種文化思想，是所謂交互主義(Mutualism)，以別於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或集體主義(Collectivism)。個人主義表現為今日英美式政治民主，集體主義表現為蘇聯式經濟民主，我們的交互主義乃可發展成為倫理民主。可惜近數十年來，這固有的一家，却給浮層的膚淺的自由平等之說弄壞了，以致惡化了。夫婦相互間的正當關係和美德，早被遺忘和蔑棄，西洋的時髦潮流雖已衝入，而我們對於「法」和科學精神，本無素養，權利義務的概念和教育，可以說大部未曾普及，彼土的宗教信仰，空見教會林立，深入鄉陬，但也沒有像當年佛教那樣深密織入於中國的人心。所以中國現階段的倫理界，實在陷於空虛。而且西方的小家庭，本立基於他們固有的個人主義之上，有它長處，也有它老大的弱點。這就是以「法」相維，不免峭刻寡恩，未足

為訓。我們為什麼一定要盡棄我之所有而毫無批判地來模倣它呢？

照作者見聞所及，現今我國的「家」，什九已弄到渙散零亂，尤其是都市的家庭。老者無依，幼者失恃，中年者則為職業為生計而逐逐於街頭。舊日以情相結的家族，固已被打爛拆散，而於西方以「法」相維，以「信仰」相繫的那一套制度，因為沒有背景和基礎，完全承受不起來。作者本人躬跨新舊兩代，身歷其境，比照今昔，羅羅清楚。昔日「夫婦」「父子」「兄弟」那種倫常思想，那種祥和容讓的風氣，一掃無餘，代之以浮薄、虛驕、乖戾、混亂，於是整個社會的空氣就變惡濁而沉黯了。因為老根子的「家」，基本精神的交相主義，生命根莖的偶性，於今全被斬斷，這是最大的悲哀！殊不知中國的「家」是代表着一種獨特的文化精神，以夫婦（名分上的德性的）為核心，以交互性對待性為根基的一種文化體系。它是無所謂自由的自由，無所謂平等的平等。它是論理的民主，而可調融適度容納政治民主和經濟民主。中山先生謂中國有道德哲學和政治哲學為西方所不逮，歐美也應來相取法云云（見其民族主義講辭），就是指的這個。作者並非戀舊，更非復古，然決不主張斬去了老根子而另換過一顆樹。我們應當自為培育，應當整理改造，應當發揚光大，但不能想像將中國民族滅絕而另換新種，將中國河山毀棄而另找一個地域。我們如要生存，必須生存在這塊土地上，必須生存在這個老家！咳，我們的家鄉呀，我們必須趕緊把它重整起來！

合 訂 本 約 預

本刊二卷下冊（一三—二四期）合訂本，發售預約，實價三萬元正，平寄郵資一千元，十月底截止。讀者諸君，預約從速。

本社發行部

老人問題的癥結

潘光旦

最近在本年六月二十八日的倫敦泰晤士報上看到一位古德諾爵士所著的一篇關於英國老人問題的文字。這文字一半是報告性質，一半是議論性質。報告的部份說到最近英國成立了一個『國家安老會社』。倫敦一地，原先有一個納斐爾特基金會，其宗旨之一就是『安老』，特別是窮而無告的老人。基金會設有一個委員會，專門調查與研究戰後社會急遽變遷中的老人問題，這會社的產生便由於委員會的建議。其目的自在推廣與匯合對於老人的維護運動，使成為全國化，也在使此種運動更具體化，可以募集捐款，建置基金，規劃與創制種種有關老人福利的事業，不只是提倡而已。所以它是一個會社，甚至於是一個公司，根據英國的公司法辦理的。它的性質和中國社會裏所時常遇到的『協會』迥乎不同，決不會是吹打一陣便而消滅於無形的。

這篇文字也追述到調查委員會的報告書。據說這報告書做得十分周詳，在英國人對於老人問題的瞭解上又添出簇新的一章。英美兩國的老人，情境可憐，是一向司空見慣的事，不過經報告書的一番敘述以後，便越發覺得鑿鑿有據，使稍具社會意識的人，不能再視若無睹。同時，這報告書別有一番精到之處，就是它把老人問題的發展和人口的發展聯繫了看。在醫學衛生日益發達的今日，又在出生率逐漸降落的國家如英國，老人的數量，比起其他年齡組的人口來，勢必一天比一天相對的增加，而問題也勢必一天比一天嚴重。在今日的英國人口裏，到達可以領取養老金的年齡的人是八個中一個，在四十年以後，這比例只能是五個中一個；老人越是充斥，問題自越感困難，及今不預為籌劃，前途將根本無從措手。至於報告書也列敘到許多個案的生活史與安老機關的管理情形，把老年獨居的慘象以及庸人謀事的不臧，充分的暴露出來，也為以前同類的文字報告所不及。還有一重要之點，就是調查的結果發見養老金的制度，在目前生活融

度之下，是足以應付的；在接受養老金的人中間沒有赤貧的分子。

關於老人的福利設備與其原則，古德諾氏又有如下的討論。設備可以分兩類：一是屬於建置性質的，主要的目的是在解決老人的居住問題。為了體氣尚屬健全，能獨立生活，而夫婦兩存的老人，最適宜的是單獨住宅的辦法，而此種住宅應與尋常人家的住宅參雜在一起，有如通行的新村組織。其次，半獨立而比較龍鍾的鰥夫寡婦則可以加入一種寄居性的俱樂部或稱總會，使進可以有相當社會交際，退可以維持其私人生活。第三種的辦法是規模不宜太大的老人共居的一種院落，但不是在老人院。第四種是休養所，專為老病者而設。第二類是屬於零星服務性質的，目的在增加生活的興趣，減少風燭殘年的痛苦，例如普通的俱樂部與娛樂的設施，友誼的訪問，熱餐的巡迴送賣，採購與家事的協助，等等。這些，目前都已有人在辦，公家與私人團體辦的都有；但數量太少，去周徧的程度很遠。尤其不敷分配的是單獨的住宅。我們於此不能不感覺到這些老人福利專家的希望未免太奢。戰後的英國正大鬧着房荒，即使此種住宅稍稍增多，試問如何會輪得到對社會已無甚貢獻的老人。我們說他們希望過奢，因為事實上目下英美等國最普遍的安老辦法還是那近人間地獄的養老院。

至於這些比較合理的設備所遵循的原則，自比設備本身更有意義。不過古德諾氏的討論只是偶然提到它們，我們聯綴在一起看，則有如下列：

一、安老的事業應竭力避免救濟的性質。

二、安老的場所應家庭化，而不機關化；養老院、老人院、老人堂一類的稱呼便富有機關化的臭味，且不論內部的組織管理如何。

三、安老工作應就老人的物質與心理的需要兼籌並顧。經濟並不是老人問題的最重要的方面，特別是在有養老金制度的國家。

四、老人轉移安老的場合時，應不使其有『毀巢』『拔根』之感。

這些設備與原則都想得很週到，很體貼入微，但果能解決老人問題麼？我認爲不能，我想中國人，凡屬對於舊習慣有過一些經驗，舊倫理有到一些瞭解的，都認爲不能。於是中國的舊辦法而不甚明白英美的辦法的人，驟然看到上文的討論，恐怕第一個反應是覺得莫名其妙，覺得爲甚麼英美人士對於老人的安置要如此其囁嚅，如此其庸人自擾。

這就根本牽涉到了關於家庭與家制大小的理論。中國人一向主張大家庭制，主張『上有老，下有小』，主張抑事俯蓄，我說主張，因爲未必人人做到，且事實上做不到的恐怕不在少數，但它總是一個標準，太違反此標準的人不免受輿論的指摘。英美則主所謂小家庭，小家庭制裏沒有老人的地位，老人儘可以自成一個小家庭的單位，與已經成立的子女的家庭劃分得很清楚。老人之成爲問題可以說是從此開始的。配偶兩全的老人問題比之簡單，因爲他們多少還像一個家庭。鰥的寡的問題就困難了，於是就不得不有老人院一類的辦法。這問題又分兩部分，一是經濟的，二是經濟以外的生活的。老年保險或養老金制度實行以後，在國家與社會的嚴重負擔之下，第一個問題算是有了解決的方法，但第二個問題卻始終存在。上文所介紹的一番討論就想在這方面覓取解決的途徑。

但這一類的討論與設施並沒有能搭着問題的癢處。所謂經濟以外的老人生活，最主要的是他的情緒生活。情緒生活不止一方面，尤其主要的一方面是一種存活的願望與死亡的恐懼所引起的情緒。老人是風中之燭，眼看自己不久就要蠟乾蕊盡，除非他有特殊的哲學的涵養，是不能無動於中的，既有動於中，便不能不求解脫。歷來解脫的途徑不出兩三條。一是個人功德事業不朽的信念，或對於『身後名』的企求，這也只有少數人能之，可以不論。二是在子孫身上得些寄託，得些慰藉，這是很實在的，因爲子孫畢竟是自己血中之血，肉上之肉，子孫世代的傳遞相當於一己生命的局部的延續。不過真要得到慰藉，其間還有一個重要的條件，就是要和子若孫生活在一起，只是名分上有子孫是不够的，必須手裏時常地抱到孫兒，眼前隨時看到孫兒成長，才比較的躊躇滿志。三是靈魂永生的宗教信仰。大多數人所能領略的便是後面這兩條解脫的途徑。以前的中國人在這兩

條路上都走得通，並且兩條還併成了一條，養生送死，生事死祭，一類的議論便表示兩條路早就接了軌。在中國，老人之所以未成問題者在此。

至於英美一類的社會裏，老人所能走的解脫之路打頭就只有一條，就是第三條，宗教信仰所允許給與的永生。在小家庭制度之下，第二條根本沒有地位。但自宗教的號召力日就減削以後，這第三條路又將鞠爲茂草，走不大通。死亡的威脅在後面追逐，而前途卻又無路可走，於是老人乃成了問題。科學與機械文明昌大以後，一方面有醫學衛生延長了人生的壽命，一方面又有工業技術縮短了工作的年齡，再一方面遲婚節育又增加了老人的比數，於是問題愈益見得嚴重。

在二十年前，美國的高度機械化的工廠裏便已開始不雇用年在四十以外的工人。當時就有人說，一個工人，到了四十二歲，就工業的定義講，就算是老人了，工廠已無所用之，亦即工業社會已無所用之。英國的情形恐怕也差不多。換言之，在高度工業化的社會裏，特努力爲生的人，四十以後，多少便等於行尸走肉，對生命已經是沒有期望，生機已等於斷絕；而事實上這大堆尸肉在世上行走，平均還須二十多年，因爲人口學家告訴我們，近年來醫學發達，健康進步的結果，任何美國人不呱呱墮地則已，否則便有六十五年的生命的期望，豈不是一大矛盾？是的。這是但知講求工業化的文明的一大諷刺，而四十歲以上的大量的老人便是這矛盾中的犧牲品，便是這諷刺的人證（物證該是一面生產過剩，一面人有失業凍餒之憂等一類的現象）。

我所瞭解的老人問題如此。如果作如此瞭解，則真正的解決便應別有途徑，而決不是『國家安老會社』一類的組織與其所提出的原則與方案所能爲力。若問此別有的途徑是甚麼，則根據上文的討論，有效的似乎只有兩條，一是機械工業制度的重新安排，二是家庭制度的另行調整，前者死以使未老的『老人』維持其生命的機能，後者所以使已老的老人減少其死亡的威脅。

△△

△△

△△

論外匯平衡基金委員會

陳嘉傑

本年八月十九日行政院公布中央銀行管理外匯辦法及進口貿易辦法，

此項修正新辦法之要點：（一）維持官價外匯不變；行政院核定棉花、米、麥、麵粉、煤、及煤焦六種進口物品，按官價結匯。（二）另訂外匯市價：凡核准進口物品所需外匯及各項正當外匯需要，由中央銀行或指定銀行按市價供給。（三）設立外匯平衡基金委員會；政府為平衡市場外匯供需，調節匯價起見，特設外匯平衡基金委員會專司其職。此項修正新辦法之預期效果約有：（一）活潑出口貿易，（二）增加出口外匯收入，（三）鼓勵華僑經由指定銀行匯款回國，（四）打擊走私及偽匯逃避，（五）削弱外匯黑市力量。惟上項預期效果能否獲致，有賴外匯平衡基金委員會運用順利，關鍵至鉅。

外匯平衡基金委員會之職能，在於調節匯價，與平衡市場外匯供需，然匯價之調節是否適度，足以影響市場外匯供需之平衡，而市場外匯之供需能否平衡，又可影響匯價之調節，二者互相關聯，故外匯平衡基金委員會對於調節匯價，與平衡市場外匯供需，應予兼顧。

目前通貨繼續膨脹，貨幣不斷貶值，物價不斷上漲，若外匯平衡基金委員會採取釘定商匯匯價或使商匯匯價與黑市匯價保持相當距離，而又無其他補助出口貿易及華僑匯款辦法，在此種高估法幣對外價值情形下，一方面依法結匯之出口貿易必然萎縮，經由指定銀行匯回本國之僑款必趨銳減，出口走私與偽匯逃避，自必猖獗，則此次修正新辦法之預期效果，既難獲得，而外匯平衡基金委員會之外匯收入，亦復微小；他方面匯率釘定於較高水準，進口貿易利潤優厚，則申請進口外匯必多，外匯支出鉅大，收入微小，則外匯平衡基金委員會無法應付，該會平衡市場外匯供需之職能，勢必喪失。反之，若外匯平衡基金委員會使商匯匯價接近黑市匯價，則出口貿易依法結匯，華僑匯款亦經由指定銀行匯回本國，出口走私及偽匯逃避

等現象，不致發生，此次修正新辦法，若干預期效果，可以獲致，外匯平衡基金委員會平衡市場外匯供需之職能或可達到。惟商匯匯價追隨黑市匯價，可能助長黑市操縱，且商匯匯價波動過劇，亦有刺激物價之嫌，此為

外匯平衡基金委員會對於調節匯價運用技術之困難。至該會對於平衡市場外匯供需運用技術亦屬不易，第一，審核外匯申請之機構，對於外匯申請之審核如放寬，則外匯平衡基金委員會所受壓力加重，該會為求增加外匯收入，減少外匯支出，以減輕壓力起見，可能提高商用匯價，使與黑市匯價接近，如此，則前述助長黑市操縱，刺激物價之嫌，似難避免；審核外匯申請之機構，對外匯申請之審核如從嚴，則外匯平衡基金委員會所受之壓力較輕，似可無須將商匯匯價提高接近黑市匯價，惟市場不能獲得申請所需之外匯，將轉求黑市，黑市外匯需求增加，黑市匯價必漲，若商匯匯價不隨黑市匯價提高，仍保持相當距離，則前述走私逃匯等不利現象，又復發生。第二，外匯平衡基金委員會本身並無基金，僅在中央銀行設立外匯平衡基金戶，向中央銀行借用之外匯數量，據推測亦不多，若因出入口貿易季節不同，市場外匯供需偶不相抵，外匯平衡基金委員會自可隨時予市場以協助，苟市場外匯供需發生長期繼續鉅額失衡現象，則該會莫能協助，即強予協助，亦屬徒耗基金，無補於目的。英國於一九三〇年秋季到一九三一年秋季，及我國於民國二十八年春季成立之中英外匯平衡基金，民國三十年春季成立之中英美外匯平衡基金，為平衡市場外匯供需，穩定匯價，皆損失鉅額外匯，終不免於失敗，可為證明。英美等國放棄金本位制後，設立外匯平衡基金所以能達成平衡市場外匯供需，穩定匯價任務者，係因各國經濟恢復常態，運用外匯平衡基金為應付市場臨時需要，以免臨時市場外匯供需失衡，引起匯價波動。在變態經濟時期運用外匯平衡基金

，以求平衡市場外匯供需，穩定匯價，鮮克成功。

由上所述，衡之理論，證諸史實，在變態經濟時期，外匯平準基金成功之希望固小，而運用技術亦至困難。爲減輕外匯平準基金委員會運用技術困難起見，下列各點，似應注意：第一、嚴厲緝私，防止偽匯逃避，取締黑市：進口走私，足以增加黑市外匯需要，刺激黑市匯價；出口走私，與偽匯逃避，直接減少外匯平準基金委員會之外匯收入，間接增加黑市外匯力量，走私逃匯猖獗，黑市熾盛，不僅爲管理外匯貿易政策下之大敵，亦爲外匯平準基金委員會運用技術上之最大障礙，倘能嚴厲緝私，防止偽匯逃避，則黑市外匯雖未必全歸消滅，然其力量微弱，無足輕重，則外匯平準基金委員會對於調節匯價與平衡市場外匯供需，可以運用如意，無所牽慮。惟進出口走私與偽匯逃避，以香港爲大本營，黑市外匯以香港爲重心，香港黑市外匯波動，實爲國內黑市外匯波動之前導，倘能取得香港政府合作，協助緝私，取締黑市，對於配合外匯平準基金委員會發揮效能，大有裨益，此所以我國政府亟求簽訂中港金融經濟合作協定，惟該協定簽訂後，是否能收所期效果，須視香港政府履行協定程度，與我國緝私機構努力如何。第二、穩定物價：匯價之提高、有兩種原因：（一）物價未變動，匯價因供需關係或其他原因而提高，匯價提高，則進口貨物或用外國原料製成之物品，因成本增高，物價隨之上漲，此爲匯價直接刺激物價；（二）物價已上漲，匯價相對提高，然匯價提高，市場心理受刺激，物價與黑市匯價更漲，於是提高匯率所應得之效果，全被沖消，我國目前物價與匯價之關係，大半屬於此種情形，使外匯平準基金委員會對於調整匯價，進退爲難，躊躇却顧。第三、審核外匯申請之機構與外匯平準基金委員會應互相密切聯系：調節匯價，平衡市場外匯供需之權在外匯平準基金委員會，而審核外匯申請之權在輸出入外匯管理委員會及中央銀行非進口外匯審核處暨行政院，兩者之職掌在表面上似不相關聯，惟審核外匯之寬嚴，足以影響外匯平準基金委員會所受壓力輕重，故審核外匯之機構應視市場外匯供需情形及外匯平準基金委員會頭寸鬆緊，以定審核寬嚴，而外匯平準基金委員會亦應將市場外匯供求情形及該會頭寸鬆緊狀況，隨時報送

審核外匯機關參考，兩者互相密切聯系。

總之，外匯平準基金委員會所負使命雖大，惟在目前經濟情況下，該會所能發揮之效能，至爲微小，該會是否有繼續存在必要，不無可疑，如仍繼續存在，則其所應保持之原則爲：對匯價之調節，應採取主動，勿緊隨接近黑市，以免刺激物價。雖則穩定物價之責任，不能加諸該會，然該會之措施應勿刺激物價。凡足以刺激物價之任何舉措，皆不值稱道。

本刊自三卷起，另定訂閱辦法，售價亦將調整。茲爲優待讀者起見，十二月份仍照原價預訂，訂者從速。本社發行部

民國三年創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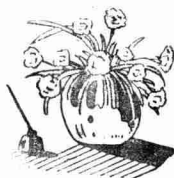
總行

上海 江西中路五五號（九江路口）
電話 一二八六三轉接各部

新華信託儲蓄銀行

分行

北平 天津 漢口 重慶
香港 南京 廈門 廣州
長沙 蘇州 昆明 無錫



文藝

開始寫劇後的莎士比亞

——英國文學漫談之二——

李美

莎士比亞二十七歲的時候，他的第一部戲劇「枉費的愛情」(Love's Labour's Lost)寫成了。這是一部帶着諷刺意味的喜劇。他那時正嗜好於他造作的華美的文字，這一部戲劇就是他用他認為華美的文字寫成的。這一個劇本，雖然沒有什麼特色，但在當時伊利沙白時代文壇上的情形看來，仍是不可多得之作，何況他的年紀還祇那麼輕。他愛好花草和小鳥，他深刻地了解大自然的一切，在他的家鄉瓦維克州(Warwickshire)那兒的綺麗風光，對於他寫這一個劇本的影響很大。同時，關於史特佛(Stratford)一帶的人物，如當時的女孩子，教區的教師和一般的鄉俗，都描寫盡緻。從莎翁二十七歲到四十七歲的二十個年頭當中，「枉費的愛情」是他所著三十七個劇本中的最初一部。那詞句的美麗，與思想的湛深，實在令人百讀不厭。自莎翁作古迄今，雖然已過了三百二十一年，但他的戲劇仍舊在世界各地上演，他的著作與思想，仍舊為世界的學者所稱仰、研究。今日我們從莎翁戲劇中所得到的快樂，實遠勝於三百多年以前那生活在莎士比亞時代裏的人。

無怪乎你要奇怪：像莎翁這樣一個來自鄉村的青年，沒有受過高深的教育，也沒有碰上倖進的機會，僅僅為了他的無比的天才，超人的智慧，

和熟練的技巧，而寫成的詩劇，居然可以名垂千古。我們翻開整個的世界歷史，要想找到像莎翁這種偉大的天才並有能力的人，實在少見。我們不可忽略莎翁有一種能够深深地體會人們的心境和瞭解萬物的才能，這些從他的取材，劇情，對白，甚至每一個字中都可以看得出來。

善與惡，年青與老邁，聰明與愚蠢，快樂與悲哀，富與貧，這些在心理學上甚難求得明白的答案的人類的知識，莎翁把牠們抓得很牢，都明白地表現在他戲劇的人物中。莎翁戲劇中人物的描寫異常逼真，他們的一言一行，他們的心理轉變，幾乎就是現實社會中各種人物的蛻變。無怪許多批評家說莎翁的戲劇「不僅是一個時代的，而是永恆的」(not for an age but for all time)。

「枉費的愛情」一劇的故事，是莎翁自己創造的材料，但莎翁其他許多劇本的故事，差不多都是根據歷史，神話(Legends)，傳奇小說(Folk-mances)和古時候有名的劇本而改編的。他把這些陳舊的故事重新渲染，使得那些事物變得更美麗而動人。這種創造的能力，的確與他那稀有的天才有着很大的關係。

自從莎翁寫了幾個劇本以後，他立即便成爲一位爲人民愛戴的劇作家，因此，不免引起少數演員和作家的嫉妒，當時有一位作家竟諷刺莎翁是「一隻崛起的烏鴉」(an upstart crow)。彭·姜生(Ben Jonson)是當時大作家之一，他雖然也是莎翁的朋友，但他有時也不免要說些對莎翁不利的话。這種嫉妒對於莎翁，並沒有什麼作用，因爲他是那麼的篤實，那麼的量大，那麼的自得和那麼的坦白。因此他得到了羣衆的愛慕與尊敬，這些羣衆不僅是當時的作家與演員，並且包括了當時達官與顯貴。

莎翁在當時的出名，並不是專靠着舞台(因爲那時他曾在倫敦當演員)，而是伊利沙白女皇和她的朝臣們對於他的欣賞。在「枉費的愛情」未完成之前，莎翁所寫的詩，即爲那時愛好詩詞的女皇和爵爺們所愛好。莎翁登台表演的時候，女皇幾度親往觀劇，因此她對於莎翁的垂愛，更爲加深。

不僅如此，就是伊利沙白的繼承者詹姆士第一，對於莎翁的戲劇也非